

全球智库半月谈

中美关系：是冲突与遏制还是竞争与合作？

从北美自贸协定到美加墨协议：变化与展望

中国出口对第三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有关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研究

多德-弗兰克法案对小企业的影响

空前重要的美日关系

本期编译

安婧宜

宋海锐

史明睿

申劭婧

吴克谦

熊春婷

伊林甸甸

杨茜

张寒堤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承担的编译项目，每半月定期发布。所有稿件均系网络公开文章，由项目组成员依据当前热点编译组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组

顾问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 斌		姚枝仲	
团队成员	曹永福	美国经济	陆 婷	欧洲经济
	冯维江	日本经济	熊爱宗	新兴市场
	徐奇渊	中国经济	杨盼盼	东盟与韩国
	肖立晟	国际金融	李远芳	国际金融
	常殊昱	跨境资本流动	顾 弦	大宗商品
	陈 博	大宗商品	吴海英	对外贸易
	崔晓敏	对外贸易	熊婉婷	金融政策
	王 地	宏观经济	张寒堤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 长	张宇燕			
召集人	徐 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 张寒堤 邮箱:iwepceem@163.com 电话:(86)10-8519 5775 传真:(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4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中美关系：是冲突与遏制还是竞争与合作？ 7

导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中美关系正逐步走向全方位的对抗。笔者认为，二十世纪早期的英德关系从紧张走向对抗，并最终引发一战的历史教训对今天的中美关系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果中美两国的决策层能够吸取历史教训，那么中美将再次从合作与和平中共同受益。

从北美自贸协定到美加墨协议：变化与展望 11

导读：经过一年多的谈判磋商，在截止日期 10 月 1 日前几个小时，特朗普政府和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领导的政府达成一项协议，使加拿大成功进入与美国、墨西哥达成的新三边自由贸易协议框架内，这一协议取缔了为期 25 年的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对于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来说，这是贸易和投资的倒退 ... 15

导读：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谈判尘埃落定，其内容主要更新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它渐进有效的改善了 TPP 协定中相关政策领域的高标准。然而，新协定没有如北美自贸协定那样加强美墨加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一体化，相反，它施加了新限制，如提高汽车行业的免关税进口资格，加大对 232 条例在汽车行业实施限制的可能性，降低地区的政策的可预测性，阻止墨西哥或加拿大与中国等非市场经济体的正式贸易和投资关系等，这些将阻碍地区贸易和投资，扼杀经济增长的潜力。

全球金融危机 10 年之后的经济复苏 18

导读：在 2008 次金融危机之后的一年里，世界上有一半的国家经济活动有所下降。我们在《十月世界经济展望》第 2 章中的分析表明，许多国家当前产出仍远低于假设没有危机的普遍产出水平。此外，还有迹象表明，危机可能通过影响生育率和移民以及收入不平等而对潜在增长产生持久影响。尽管有这些影响，但具体政策确实影响了各个国家在危机后的表现。那些财政状况好转、银行监管更完善、汇率弹性较大的国家，损失通常较小。

聚焦中国

特朗普对中国加征 2600 亿美元关税正式化并展望下一阶段 .. 20

导读：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于 9 月 17 日宣布，他计划从 9 月 24 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另 2000 亿美元产品征收关税。中国表示将对其进行报复，这无疑将引发特朗普的再次威胁。

他已明确表示有意对所有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税。本文分析了特朗普对中国征收关税三个阶段的商品特征，并对美国下一步的行动进行展望。

中国出口对第三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25

导读：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以葡萄牙为例，分析了中国国际贸易的扩张对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导致第三国市场竞争加剧，从而对葡萄牙工人的工资和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女性、年龄较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影响更大。

中国大湾区拥有真正的经济实力 28

导读：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建设的背景下，港珠澳大桥即将建成通车，香港、澳门、珠海的基础设施连通性进一步提升。大湾区的经济体量和人口数量已经可以媲美部分亚洲主要国家，区内企业正在由“世界工厂”逐步升级到价值链上游。未来，中国的这一地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加。

有关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研究 30

导读：Sonali Jain-Chandra 在 IMF 官方博客发布的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表格，表明了 1990 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由 15 上升到了 50。近年来，中国不平等情况加剧。教育差异和城乡收入水平差异都造成了这一现象。而中国也通过改变税收政策、调整个税起征点来缓解不平等状况。与俄罗斯的对比表明，中国改革开放是渐进且全面的，不平等状况较之俄罗斯更轻。而与美国的对比表明，在剔除房价影响前后，中美不平等对比情况有所改变。

经济政策

多德-弗兰克法案对小企业的影响 34

导读：颁布于 2010 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 (DFA) 本意是为克服导致 08 年金融危机的美国金融业过度杠杆和系统性风险的问题。但是自从其颁布之后，很多人质疑它导致了银行对小型企业贷款规模的大幅下降，不利于小型企业的发展。本文作者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

战略观察

空前重要的美日关系 37

导读：在近期的中美贸易战中，令许多人高度担忧的，是美日欧是否会携起手来，建立一套排除中国的国际贸易体系。在 CSIS 近期发表的一份政策报告中，包括约瑟夫·奈在内

的几位作者明确指出,美国有必要对美日同盟进行一系列改革,加强日本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并呼吁日本率先在亚太地区推行缩小版的 TPP (即 CPTPP)。

本期智库介绍 42

中美关系：是冲突与遏制还是竞争与合作？

Anthony H. Cordesman/文 张舜栋/编译

导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中美关系正逐步走向全方位的对抗。笔者认为，二十世纪早期的英德关系从紧张走向对抗，并最终引发一战的历史教训对今天的中美关系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果中美两国的决策层能够吸取历史教训，那么中美将再次从合作与和平中共同受益。编译如下：

在国际政治当中，我们时常难以区分哪些行为是故作姿态、哪些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过，自去年以来，绝大多数观察人士都赞同一点，那就是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稳步的恶化过程。中美两国不仅真的打起了贸易战，而且双方还都加大了国防开支，试图在亚太区域保持支配性的军事力量。国家间的战略性关系往往是被四个“C”所塑造的——合作（Cooperation）、竞争（Competition）、遏制（Containment）、冲突（Conflict）。而在如今的中美关系中，哪些“C”会成为主导因素呢？

诚然，中国的快速崛起对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地位带来了一定挑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迅速发展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优化国际产业分工、推动国际贸易等多个角度使美国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意味着一个零和游戏。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尽管中国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里与美国展开竞争，但双方完全没有必要谋求在每一个领域里胜过对方。举例来说，许多国家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的竞争——无论哪个国家领先——都最终能使全世界普遍受益。当然，还有许多领域是中美双方可以有效开展合作的，两国间的合作将给全球带来更大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但令人遗憾的是，如今中美双方似乎都更加关注竞争，而非合作。更糟糕的是，双方对国防安全和军事遏制的重视与过去相比都大大加强了。而这个过程意味着，中美之间遏制与冲突的界线将变得愈发模糊。如果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各种相互遏制的行为是否会逐步升级，并最终危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有必要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一百多年前，崛起的德国与强盛的英国间爆发了长时间的争夺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地位的竞争，这种竞争最终走向失控，并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当时英德双方的决策者们是否能清楚地区分这四个“C”呢？恐怕并没有，否则双方也不会一步一步被拖入后来那场没人愿意看到的全面战争。一战的余波直接奠定了二战爆发的基础，并深刻影响了之后百年的世界局势。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我们理应从历史中深刻吸取教训。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类的天性使得我们很难从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正如任何一个现实主义学派的外交学系都会教学生铭记的“桑塔亚那谬误”所指出

的那样——永远不要指望别人能记住过去的教训。如果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过什么，那可能就是：人们究竟能不能记住历史并不重要，因为相似的历史总是不断地重复出现。伟大的哲学家桑塔亚那曾说过：“只有死人才能看到战争的终结。”

准确评估遏制与冲突的成本

目前，中美双方的当务之急都应迅速、准确地重新评估遏制与冲突的成本。美国在新发布的国家安全与国防战略中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新兴威胁，并将之定位为军队建设的主要目标。这份报告还将中国与俄罗斯放在了一起，这有可能进一步促使后两者抱团取暖、走得更近。

相比之下，中国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就显得含蓄得多。不过，从中国近期一系列的行为来看（这些行为包括强有力的军事改革、对南海主权的强硬声索，以及在关键领域迅速的技术突破），中国正在迅速构建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上有效制衡美国的能力，这无疑会使美国感到威胁。

正如 1880 年到 1914 年间的英德海军军备竞赛一样，如今中美之间也在上演着昂贵且危险的军备竞赛，双方都谋求获得更强的实力以达成遏制/反遏制的战略目标，这都会使得战争的可能性愈发增大。

另外，我们还万万不可忽略紧张局势的外溢效应。中美两国谋求遏制双方的行为也会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选边站队，这可能最终导致后果难料的连锁反应。此外，战争绝不是遏制与冲突关系所能带来的唯一恶果。增加军费开支意味着减少民生支出，而中国目前还有许多贫困人口没有享受到现代经济的福利，中国人口结构也在迅速老龄化，而其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在遏制与冲突的战略关系里，居高不下的军费开支所带来的恶果最终一定会反映在宏观经济上。而对于美国来说，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近年来军费开支占 GDP 的比重已经从冷战结束后的 4% 上升到了 7%，而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早已被债务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此外，美国还必须保持强劲的国内经济，才能够在与中国、欧洲及其他国家的竞争中保持优势。

战略对抗升级或将带来深远影响

近几年来，亚洲国家间的国际关系已经出现极化趋势，许多国家开始在中美间频繁试探，部分国家甚至已经盘算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此外，中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中国前不久刚刚参加了一场由俄罗斯组织的规模史无前例的对抗演习。此外，中国还被迫以更频繁的频率展示自己的核武器与战略打击能力，这使得本已陷入泥潭的国际核军控前景更加不乐观。

中美两国的军力竞争早已不仅限于辽阔的大海和紧张的前线，就连科技界也强烈感受到了这股竞争的气氛。中国一直以来都积极谋求来华美资企业以市场换技术，并在最近几年大幅加快了海外技术并购的速度，不少人担心这可能间接增

强中国的国防实力。此外，中国的网络战能力也十分强大。事实上，在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什么领域的技术不能被运用到未来战争中去。

此外，美国军方近来在中国近海和空域的抵近侦察行为越来越大胆，而中国则回应以愈发频繁的远海训练。中国采取包括收购港口、发展海军、采购海空军装备在内的一系列手段，试图将自身的战略影响力投射到远及菲律宾、日本、东南亚、夏威夷，甚至是印度洋的广阔地域。美国对中国发展导弹装备、南海造岛以及建造和训练航母编队的行为已经高度关注。美国还试图加强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其他东南亚盟国的一系列军事与战略支持。

倘若未来几十年里中美关系日益紧张，那当然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然而更糟糕的是，这还远远不是故事的全部。一旦两国关系持续紧张，那么双方之间冲突和摩擦将会越来越多。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多么小的摩擦，都可能逐步升级，直至超出两国的控制范围。此外，像中美这样两个超级大国，想要在小规模摩擦和冲突上完全战胜对方是很困难的，因为占居下风的一方总会想方设法在别的战场上找回面子，并使得局面逐渐变得不可收拾。

沉痛的教训

从目前来看，中美两国领导层都无意在战略对抗的道路上收手。双方都谋求增强己方技术实力，并试图在对抗中取得优势；双方都调整了战略姿态，愈发多地发表带有遏制和冲突色彩的言论；双方还都在积极谋求未来的胜利，哪怕这种胜利将给对方带来损害。事实上，从历史经验来看，所有参与了事实上的军备竞赛的国家都会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并且逐渐在这条道路上迷失方向，片面地忽视这种战略所带来的风险和成本。但正如我们之前强调的，预知未来并不等于能改变历史，因为人类吸取历史教训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早在 1909 年，著名政治家 Norman Angel 就在他的著作《大幻觉》（Grand Illusion）中批评了进行海军军备竞赛的德国和英国，并警告这种竞赛可能给双方带来不可预知的灾难性后果，但这并没有能唤醒执迷不悟的英德两国高层。自现代以来，国际关系学界的分析人士都逐渐开始重视准确评估政策成本的重要性。如今中美两国的决策高层也不应该仅仅盯着自己的战略和安全利益，而应该同时考虑紧张局势在长期给双方可能带来的综合成本。

如果仅从国家安全和战略对抗的角度出发，美国如今奉行的战略和中国相应做出的反应似乎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中美两国间复杂关系的广阔程度，远不是单纯的国家安全或是战略对抗所能囊括的。因此，当代的智库、研究机构和学术界都有天然的责任，通过扎实的研究来说服中美两国领导层重新认识到合作与和平竞争所能给双方带来的巨大益处。否则，二十世纪的悲剧便有可能在当代再次上演。

本文原题为“China and the U.S: Choosing Between the Four “Cs”。本文作者 Anthony H. Cordesman 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首席研究员，他还曾担任美国国防部的阿富汗事务顾问。本文于 2018 年 10 月刊于 CSIS（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从北美自贸协定到美加墨协议：变化与展望

Jack Caporal 和 William Alan Reinsch /文 张寒堤/编译

导读：经过一年多的谈判磋商，在截止日期 10 月 1 日前几个小时，特朗普政府和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领导的政府达成一项协议，使加拿大成功进入与美国、墨西哥达成的新三边自由贸易协议框架内，这一协议取缔了为期 25 年的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编译如下：

新的三边协议，也就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USMCA）被各国领导人称赞为一次胜利。特朗普政府和他的贸易团队声称，这个协议将重新平衡美国与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关系，并且也能为美国汽车工人和农民带来福音。尽管美加墨协议（USMCA）保留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核心内容——三国之间的免税贸易，但对其前身还是有一些实质性的补充和修改。一些美国的最极端提案被驳回，而一些所谓呼吁“现代化进程”的提案却成为最终协议的组成部分。一位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表示，在某些领域，美加墨协议会成为特朗普政府未来签订贸易协定的新模板。虽然与欧洲的明显“停战”，会让特朗普政府有更多精力来关注与中国逐渐扩大的贸易争端。但是美加墨协议依旧存在一些问题值得美国关注和警惕。

1、一问：与北美自贸协定相比，美加墨协议有哪些显著变化？

我们可以从下述领域看到美加墨协议的显著变化：

（1）汽车原产地原则

美加墨协议要求 75% 的汽车零部件由北美地区生产，以使汽车能够达到享受优惠或者免税待遇的资格。相比之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原产地规定比例为 62.5%，在美加墨协议要求 75% 的政策优惠门槛下，其中 40%-45% 的汽车零部件必须由时薪 16 美元以上的工人制造。这个新工资要求将在五年内分阶段实施。因为墨西哥汽车工人的薪资水平相去甚远，所以这一条款基本上是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要求。特朗普政府可能放弃了一些额外的汽车制造业岗位，以求提高汽车的销售价格，并且换取一个竞争更少的汽车业。美加墨协议的原产地原则以及工资要求可能会破坏围绕北美自贸协定原产地原则设计的供应链，新协议还会对汽车制造商获得特定汽车零部件的原产地加以限制，这可能会增加汽车的制造成本。

（2）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包含在北美自贸协定中的特别仲裁机制将会在美国以及加拿大逐步施行，但由于墨西哥的经济开放程度较低，仲裁机制的覆盖范围会为墨西哥投资者进行大幅调整。这个机制允许投资者起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采取的歧视性行为。美加墨协议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在墨西哥境内只包含对石油天然气、发电服务、电信服务、交通运输服务以及基础设施所有权管理方面投资的仲裁。ISDS 的设置是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 (Robert Lighthizer) 的一次重大胜利, 他将其视为企业通过提出诉讼来对抗国家主权的手段, 也是对鼓励外包业务引发政治风险的保险栓。

(3) 乳制品与农业市场准入

美国能够获得加拿大严密保护的乳制品、蛋类和家禽市场的准入资格, 并且允许加拿大向美国出口更多的乳制品、花生和白糖。美国对乳制品市场的开放是特朗普政府做得更好的一个方面, 比奥巴马政府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 (TPPA) 的结果更令人满意。协议将使美国获得加拿大乳制品市场 3.6% 的准入份额, 相比之下,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只能提供给美国 3.25% 的市场准入份额。此外, 加拿大还承诺取消其“7 级工艺” (Class 7) 奶质项目, 该项目引起了美国乳制品业的公愤。复杂的“7 级工艺”人为地激励加拿大奶酪和食品加工制造商使用国产奶蛋白浓缩物而不是国外进口品。加拿大乳制品业谴责美加墨协议将该行业“置于危险的境地”, 但美国乳制品出口委员会却对此含糊其辞。同时美国也顺利解决了加拿大对美葡萄酒和谷物的歧视行为问题。

(4) 数字贸易

美加墨协议包含类似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中关于数字贸易的条款。对前者的一项重大改进是, 对金融服务类企业的数据本土化要求全面叫停。

(5) 低额豁免原则

美加墨协议提高了关税豁免的最低水平, 这是美国商界的首要任务。对于加拿大而言, 价值 150 加币以下的进口商品将免除关税, 价值 40 加币以下的进口商品将免除零售税。而在此之前, 加拿大进口商品关税和零售税豁免的水平均为 20 加币。墨西哥同样提升了关税豁免的最低价格水平, 从 50 美元提升到 117 美元, 而美国关税豁免的水平为 800 美元。

(6) 日落条款

美加墨协议中包含一个可续签的为期 16 年的条款, 这是一个对由特朗普政府推动, 为期五年的加-墨日落条款的巨大改进。这三个国家将会在协议生效六年后举行会谈, 决定是否将该协议再续期 16 年。

(7) 货币

这是美国第一次试图将有关货币操纵和货币政策的规则纳入贸易协定的核心条款, 美加墨协议中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将会对外汇活动的透明度进行具体要求。

2、二问：美国总统和国会将采取何种措施来实施美加墨协议？

国会于 2015 年通过的贸易促进法案（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Law, TPA Law）为贸易协定的协商以及生效制定了具体程序。特朗普总统于 8 月 31 日告知国会，他打算与墨西哥签署贸易协议，并且可能与加拿大签署贸易协议。根据贸易促进法案，有两个时间节点，其一是要在 30 天之内公布协议全文，其二是最早可在 11 月 29 日签署美加墨协议。协议内容将由特朗普政府于 10 月 1 日在网上发布，据墨西哥经济部长伊尔德隆索·瓜哈尔多（Ildefonso Guajardo）向墨西哥媒体透露，该协议可能由三国领导人在 11 月底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 G20 领导人峰会上签署生效。这将由墨西哥即将卸任的总统潘尼亚尼托（Pena Nieto）签署，赶在 12 月 1 日新任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上台执政之前达成协议。

一旦协议签订，特朗普总统有 60 天的时间报告国会，报告根据协议对美国法律进行的相关修订。在协议签署的 105 天之内，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必须撰写完成该协议经济影响的研究报告。此外，国会将不得不通过立法实施美加墨协议，国会和行政部门通常共同起草实施法案以及随附的行政行为声明（Statement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SAA）。总统必须在实施法案草案送交国会审核的 30 天前，向国会提交贸易协定的最终法律文本，和建议实施该协议的行政行为声明草案。在收到实施法案草案后，众议院筹款办公室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可以对其进行模拟审议，以更好地建议总统在最终法案出台前应该做哪些调整。模拟审议并非贸易促进法案强制要求，除了递交实施法案草案外，总统还需要向国会递交一份最终协定的法律文本副本，一份行政行为声明，一份实施法案将如何影响美国法律的说明，一份实施法案将如何实现国会在贸易促进法案里制定目标的说明。此外，总统还需要提交执行该协议的计划书以及实施法案草案。

贸易促进法案还包含特殊的快速程序，供国会审议最终的实施法案。根据贸易促进法案的规则，国会在收到总统的最终实施法案后，有 90 天的会议日时间对其进行回应。实施法案将提交给众议院的筹款办公室和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审核，前者可能需要长达 45 天的时间来审议该法案并将其报告给众议院。如果实施法案没能在规定的 45 天会议日内报告给众议院，将会自动失效，并且不能再被修改。一旦提交众议院，议会必须在 15 个会议日内进行讨论投票。根据贸易促进法案，一旦通过，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必须在 15 个会议日内进行讨论投票，否则将会自动失效。一旦提交参议院，议会在投票表决前将有 15 个会议日的时间考虑该议案。

3、三问：国会通过立法实施美加墨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

美加墨协议虽然没有在通往国会山的道路上流产，但也并非一帆风顺。到目前为止，共和党立法者已经表达了对该协议的温和支持，而一些重要的民主党人则保持中立态度，并没有完全反对美加墨协议的提案。特朗普总统周一亲承，他对自己的贸易协议在国会中的命运“完全没有信心”，并且补充道“任何向国会提交的议案都是大麻烦”。尽管该协议的某些方面引入一些管制贸易，这与共和党“自由贸易”的理念背道而驰，但共和党人很有可能对特朗普总统首次签署的贸易胜利表示支持。虽然一些民主党人会就美加墨协议关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汽车原产地原则，甚至可能是劳工规定感到欣喜，但是要求他们支持一个在民主党内极度不受欢迎的总统的“政治遗产”却是十分困难。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现在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是否会给这个贸易协定投票，或是考虑将这个议案交由新组建的国会讨论投票，新一届国会很有可能包括一个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有人认为，政府可能赶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完成研究报告之前，就将议案交由国会进行投票。然而民主党人声称，北美自贸协定的替代协议将不会在2019年之前进行讨论投票——而这仍然是最可能出现的情况。

4、四问：加拿大和墨西哥第 232 条关于钢铁和铝的国家安全关税将会发生什么变化？第 232 条对汽车的潜在关税又会怎么变化？

尽管加拿大和墨西哥免受一些汽车和零部件潜在关税的影响，但是钢铁和铝的关税并不是美加墨协议达成谅解的一部分。关于钢铁和铝关税的对话预计将会在美加墨协议签署生效后展开。如果美国强行对汽车和零部件征收 232 条款的国家安全关税，那么 260 万辆客运车辆和价值 324 亿美元的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将会获得关税豁免。而对墨西哥而言，260 万辆客运车辆以及价值 1080 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也将会获得关税豁免。

本文原题为“From NAFTA to USMCA: What’s New and What’s Next?”。本文作者 William Reinsch 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肖勒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兼高级顾问，Jack Caporal 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肖勒国际商务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10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对于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来说，这是贸易和投资的倒退

Jeffrey J. Schott /文 熊春婷/编译

导读：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谈判尘埃落定，其内容主要更新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它渐进有效的改善了 TPP 协定中相关政策领域的高标准。然而，新协定没有如北美自贸协定那样加强美墨加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一体化，相反，它施加了新限制，如提高汽车行业的免关税进口资格，加大对 232 条例在汽车行业实施限制的可能性，降低地区的政策的可预测性，阻止墨西哥或加拿大与中国等非市场经济体的正式贸易和投资关系等，这些将阻碍地区贸易和投资，扼杀经济增长的潜力。编译如下：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USMCA，下文简称美墨加协议）谈判的结束最终令人松了一口气，因为其结果本可能会更加糟糕——尽管在预期中它为美国或该地区带来新的贸易和投资机会有限。该协议通过加强环境政策和劳工活动等义务，遏制国有企业和促进数字贸易等方式，成功部分更新了具有 25 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下文简称北美自贸协定）。这些条款渐进但有效的改善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即 TPP 协定)中政策领域的高标准上。TPP 协定由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期间共同签署了该协定，但被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在上任第一周内取消。在北美关于这些政策领域争议不大，美墨加协定中的条款为未来的贸易协定树立了一些良好的先例。

北美自贸协定的好处主要是通过加强美墨加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一体化来实现的。与特朗普总统的说法相反，新协定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是在倒退的，并施加了新的限制，这些限制将阻碍地区贸易和投资，扼杀经济增长的潜力。在汽车行业，这次协议的签署是一种反常创新：这是美国谈判的第一个提高而不是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它增加了一系列代价高昂的新法规，生产商必须遵守这些新法规才能符合北美自贸协定的低关税标准——这些法规肯定会推高消费者购买汽车的成本，并极有可能减少美国汽车行业的就业岗位。很简单，该协议有意旨在对汽车行业进行不当管理，而汽车行业是这三个国家生产和高工资制造业就业的重要驱动力。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分析，随着美国工厂投资的降低和汽车部门就业的减少，新内容规则和最低工资要求可能会导致北美汽车工业竞争力下降，——这种看法和美国就业部门官员的说法正好相反。新规定要求 75% 的汽车或卡车在北美制造的能取得免关税进口的资格，这一要求高于目前的 62.5%。此外，70% 的钢铁和铝必须在北美生产，40% 的汽车或卡车必须由时薪至少为 16 美元的工人生产，或许这是为了阻止企业将组装业务迁往墨西哥。小汽车生产商要么遵守新规定，要么放弃区域关税优惠。放弃区域关税优惠很可能成为这些小汽车

生产商的选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使用任何国家的零部件，只需支付 2.5% 的最惠国关税，而不用重新调整供应链。但卡车生产商没有相对便宜的出口渠道：美国对卡车征收的最惠国关税是 25%。

由于这些规定，在美国的汽车销售已经下滑之际，北美生产汽车的成本将会上升。尽管美国经济蓬勃发展，但由于人口结构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汽车需求长期呈下滑趋势。和进口汽车相比，美国的汽车生产将失去竞争力，除非特朗普政府决定对汽车和零部件征收 232 条例关税，以提高欧洲和日本进口汽车的价格。（1962 年《贸易扩张法案》中第 232 条例允许政府援引国家安全来为关税辩护，而无需国会或世贸组织进行审查，也无需为经济辩护。）即便如此，北美汽车综合体在出口到其他市场的能力方面也将失去竞争力，然而随着国内需求下降，这将是市场增长的唯一来源。

美墨加协议加大了对 232 条例在汽车行业实施限制的可能性，因为美国官员需要填补最惠国待遇 2.5% 的漏洞。这种情况并非不切实际。特朗普政府的钢铁和铝的 232 条例表明，美国政府通过使用似是而非的国家安全主张来规避最惠国义务和提高关税十分简单。加拿大和墨西哥认为将在汽车行业发生类似事情，故签署了美墨加协议，他们预计，这一签订将使它们免于汽车行业 232 条例措施的惩罚，从而使它们成为特朗普政府重组全球汽车生产和贸易的保护主义计划的同谋。但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即便是在协议下，能够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此类关税的威胁是其特点而不是一种错误，尽管这种不确定性将对北美汽车行业的投资产生寒蝉效应。

这次签署协定对其它行业的影响喜忧参半，但影响并不显著。美墨加协定确实消除了加拿大乳制品定价方案中的一些价格扭曲，这将导致美国对加拿大的乳制品的出口超过 TPP 改革预期。总体的壁垒数目减少量很低。它还要求墨西哥和加拿大提高对低价值货物征收反倾销税的[最低门槛](#)，取消对美国小型货物征收的妨害税，尽管这一水平仍远低于美国的门槛。

奇怪的是，该协议在鼓励能源产品贸易方面收效甚微。它还对纺织品和服装免税贸易的方面制定了额外标准，并限制政府采购合同的投标。

然而，针对特朗普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实施的 232 条例征收钢铁和铝的关税，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也对美国农产品施加壁垒，所以美国乳制品出口增长远不及美国农民持续承担的损失。尽管签署了新的美墨加协定，这些钢铁和铝的关税依旧存在，因为在国家安全层面上来说它们是合理的。特朗普政府应该在 11 月底美墨加协议签署之前取消这些关税，这将使加拿大和墨西哥向美国主要农产品出口商重新开放重要市场。

更令人奇怪的是，美墨加协议的创新涉及到它的投资“促进”法。贸易协定的好处之一是提高了政策可预测性，这样投资者可以更好地规划投资策略，而不必担心政策或监管的突然变化会对他们不利。然而新的美墨加协定颠覆了这一逻辑。它试图通过几项政策“改革”，对该地区协定的持久性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鼓励投资者选择美国市场，而不是其地区合作伙伴：制定一项为期 16 年的日落条款，限制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程序，并威胁或强行给美国钢铁、铝和潜在的汽车市场施加新壁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减少对美国的投资，即使它在那些有限的领域会引发短期的增长刺激，就像转移投资这样的类似条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会适得其反一样。

最后，美墨加协定试图阻止墨西哥或加拿大深化与中国及其他非市场经济体的正式贸易和投资关系。该协定要求各签约国至少在签署前 30 天报告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的协议文本，以便审查和评估该协定对北美协定的影响。经过六个月的告知后，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协议自然失效了。这一条款是特朗普政府为了阻止其他合作伙伴与中国进行交易而制定的，就像加拿大多年来一直试图做的那样。迄今为止，墨西哥无意与中国直接进行对话。但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在推进修订后的 TPP 协定，如果中国要求谈判加入亚太贸易协定，这可能会给新的美墨加协定带来麻烦。

所有这些措施加重了美国和整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的倒退趋势，尽管这种倒退可能不会造成那么大的损害，但对帮助北美的工人、消费者和经济却几乎或者说根本没有好处。

本文原题为“[For Mexico,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tep Backwards on Trade and Investment](#)”。本文作者 Jeffrey J. Schott，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9 月刊于 PII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金融危机 10 年之后的经济复苏

Wenjie Chen, Mico Mrkaic 和 Malhar Nabar/文 宋海锐/编译

导读：在 2008 次金融危机之后的一年里，世界上有一半的国家经济活动有所下降。我们在《十月世界经济展望》第 2 章中的分析表明，许多国家当前产出仍远低于假设没有危机的普遍产出水平。此外，还有迹象表明，危机可能通过影响生育率和移民以及收入不平等而对潜在增长产生持久影响。尽管有这些影响，但具体政策确实影响了各个国家在危机后的表现。那些财政状况好转、银行监管更完善、汇率弹性较大的国家，损失通常较小。编译如下：

有迹象表明，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对潜在增长产生持久影响。

1、危机成本

我们的研究以 180 个国家为样本，涵盖发达、新兴市场和低收入的发展中经济体，衡量了雷曼兄弟倒闭后十年经济活动的下降。虽然许多经济体的产出相对于先前趋势来看都有损失，但危机后的经验在各国之间各不相同。发达经济体和商品出口为主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打击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这种差异可以部分反映危机冲击各个国家的类型差异。一些国家遭受了严重的银行危机，这是全球金融恐慌的一部分，而另一些发达经济体的疲弱活动是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在全球范围内回响的。在 2007、08 年间经历了银行危机的经济体中，约有 85% 的国家的产出水平低于危机前的预期趋势值。对于那些在 2007、08 年间没有经历银行危机的国家来说，上述数字要小很多（约为 60%）。对于一些国家来说，产出损失代表了对不可持续的先期路径的修正。但是横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低收入的发展中经济体的这种广泛影响表明，当前损失已经超出了这种修正的范围。

2、可能的长期后果

我们的分析表明，危机可能已经留下了持久的伤痕，超出了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的对增长趋势的影响。例如，在许多经济体中，生育率已经急剧下降，这种发展将拖累这些国家未来劳动力的规模。另一个影响是，发达经济体的净移民（移入人口减移出人口）率在危机后有所下降。此外，收入不平等似乎已经增加，特别是在危机后的产出和就业损失很大的情况下。在某些情况下，危机前已经存在的的不平等趋势在危机后被加剧，并可能导致对执政党的失望和保护主义情绪。

3、行之有效的政策

危机前的国家政策及政策后果对产出也表现出差异性影响。这些措施影响了各国在金融崩溃造成的破坏力量下的脆弱性、所遭受的损害以及其恢复的能力。

它们可以分为三类。

遏制金融脆弱性：危机前几年信贷增长更快、经常账户赤字过大的国家会发现，当危机后金融环境收紧时，这些制约因素将更加紧密地束缚着它们。此外，危机前几年对银行活动的某些方面进行更严格的限制（例如，对银行承销和交易证券能力的限制）降低了 2007、08 年发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

缓冲和框架：有证据表明，危机前财政状况较强的国家在危机后的产出损失较小。我们的分析还发现，更大的汇率灵活性有助于减少产出损失。

危机后的政策：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采取了史无前例的特殊政策措施来支持本国经济。这些行动，特别是支持金融业的准财政措施——包括银行担保和资本注入，帮助减轻了危机后的产出损失。

4、副作用

过去十年的政策努力提振了需求，防止了导致更大的产出和就业损失的糟糕结果。金融监管的改革也使银行业更加安全。然而，其中一些政策有明显的副作用。发达经济体超低利率的长期存在增强了金融的脆弱性，特别是在未受到足够监管的银行体系之外。同时，许多经济体公共债务的大量积累和财政缓冲地带被侵蚀的现象表明，当前迫切需要重建防御系统，为下一次经济衰退做准备。

应对下一场危机的能力，关键取决于如何应对过去十年这种异常政策的副作用。

本文原题为“Lasting Effects: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10 Years After the Crisis”。本文作者 Wenjie Chen 为 IMF 非洲部门的经济学家，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担任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Mico Mrkaic 为 IMF 研究部门的高级经济学家，曾在欧洲、西半球和统计部门工作，获得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物理学硕士学位；Malhar Nabar 为 IMF 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司副处长，曾在 IMF 亚太部工作，持有布朗大学的博士学位。本文于 2018 年 10 月 3 日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对中国加征 2600 亿美元关税正式化并展望下一阶段

Chad P. Bown, Euijin Jung 和 Zhiyao (Lucy) Lu / 文 杨茜 / 编译

导读：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于 9 月 17 日宣布，他计划从 9 月 24 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另 2000 亿美元产品征收关税。中国表示将对其进行报复，这无疑将引发特朗普的再次威胁。他已明确表示有意对所有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税。本文分析了特朗普对中国征收关税三个阶段的商品特征，并对美国下一步的行动进行展望。编译如下：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于 9 月 17 日宣布，他计划从 9 月 24 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另外 2000 亿美元产品征收关税。中国表示将对其进行报复，这无疑将引发特朗普的再次威胁。他已明确表示有意对所有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税。

特朗普的最新关税来自除了他已经征收的 1000 亿美元关税的进口产品外，包括钢铁、铝、太阳能电池板、洗衣机以及最初征收 500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9 月 18 日，中国政府公布了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 600 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细节。

一旦 9 月 24 日的关税生效，特朗普仅在 2018 年就对美国 12% 的进口产品实施新的贸易限制。由特朗普 2018 年关税征收所导致的贸易伙伴报复将超过 1250 亿美元，或 8% 的美国出口额。

大多数关税都是昂贵的，但新加征的关税将打击不同类商品。迄今为止，特朗普的关税使得大部分美国企业的成本增加。新一轮加征的关税将通过购买商品越来越多地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而且中国也被卷入这一乱战：中国最初的限制措施使美国的农业和汽车出口受到限制，而最近新加征的中等水平关税则提高了美国资产类设备供应商的成本。

特朗普对中国征收关税的三个阶段

特朗普根据 1974 年通过的《贸易法》301 条款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2017 年 8 月，特朗普政府开始调查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2018 年 3 月，美国贸易代表（USTR）发布报告指出美国公司在中国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问题。美国的担忧主要涉及美国公司被迫与当地中国公司组建合资企业并分享美国公司的技术，中国公司盗窃知识产权，未对使用知识产权支付足够的报酬，以及“中国制造 2025”相关的产业政策。

4 月 3 日，特朗普宣布将对 500 亿美元自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第一轮关税涉及一系列产品，这些产品经过公开听证会、修订，最终通过两项举措——7 月 6 日和 8 月 23 日分别对 340 亿和 160 亿美元自中国进口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

由于中国宣布将于 6 月 18 日对美国 500 亿美元出口产品征收 25% 的报复性关税，特朗普要求公布第二份加征关税产品清单，对 2000 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征

收 10%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 USTR 于 7 月 10 日公布了该产品清单。特朗普随后于 8 月 1 日表示，他将把这些产品的关税提高到 25%。该名单于 8 月份进行了一轮公开听证会，并略有修改。9 月 17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 2000 亿美元进口产品加征 10% 关税（即加税的第二阶段）将于 9 月 24 日生效，并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增税至 25%。

特朗普在 9 月 17 日的公告中声明，“如果中国对美国农民或其他行业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将立即追加第三阶段，即对约 2670 亿美元的剩余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此前特朗普已于 7 月 20 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 CNBC 采访时发表过此种威胁论调。

特朗普在 9 月 7 日总结了他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方案，“我们已经向中国征税 500 亿美元，这是技术税。现在，我们又增加了 2000 亿美元加税产品。虽然我不想这么说，但是如果我愿意的话，还有 2670 亿美元产品可以在短时间内面临加税。”

哪些产品从 2000 亿美元清单转移到了 2670 亿美元清单？

特朗普新的 2000 亿美元清单包括 5745 种商品，2017 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这些商品的总额约为 1764 亿美元。他的第 1 期 500 亿美元的清单包含了 1097 种产品，涵盖了 457 亿美元的产品。由此可知，他的第三阶段潜在价值 2670 亿美元的产品清单，即自中国进口但尚未列入前两个关税清单中的产品共有 3000 多种，进口金额约为 2786 亿美元。

特朗普政府从 7 月 10 日最初宣布的 2000 亿美元产品中删除了近 300 种产品。换句话说，这些商品从 2000 亿美元的名单转移到潜在的第 3 阶段，即 2670 亿美元清单中。暂缓加税的商品总额约为 197 亿美元，包括手套、床单等家居用品，以及 Apple Watch、Fitbit 等智能手表。

图 1 显示了特朗普关税清单的商品构成。他将第一阶段关税应用于“技术”领域，针对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征税。这些关税将增加美国企业的成本，因为美国企业需要在全球市场上保持竞争力，而他们别国的竞争对手没有面临这些额外的关税。特朗普最新的第二阶段加税以及潜在的第三阶段加税越来越针对消费品。美国家庭很快将以更高的价格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买单。

图 1 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商品构成变化



中国 600 亿美元关税清单不变，但关税水平有所变化

9月18日，中国重申其8月3日的计划，如果特朗普对20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将对另外600多亿美元的美国出口品进行报复。清单涵盖了2017年美国534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唯一的修改是将征收的关税水平从5%—25%，降至5%—10%。

图2显示了中国的三个商品清单——尽管北京方面尚未表示会对尚未列入前两个加税清单的自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中国500亿美元最初的加税清单涵盖了2017年480亿美元的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汽车（归类为其他），大豆、猪肉、水果、坚果和其他农产品（归类为中间产品）中。特朗普随后试图通过高达120亿美元的补贴来平息美国农民的抗议。

图 2 中国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商品构成变化



中国对 600 亿美元进口产品加税涵盖了越来越多的中间投入品和资本类设备。北京方面可能已经认识到当提高关键部件的进口价格时会提升本国公司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它们只保留了 5% 的低加税额度。

下一步是什么？

特朗普于 2018 年 4 月 5 日就首轮关税威胁发表了电讯声明，这份声明的时间是在他首次发布 500 亿美元的关税威胁（4 月 3 日）后约 48 小时，他发现中国既没有屈服，又大胆地实行报复性加税，他对此感到沮丧。声明称“中国选择伤害我们的农民和生产者，而不是补救自己的不当行为。鉴于中国的不公平报复，我已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委员会考虑根据 301 条款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是否合适，如果合适就确定加征关税的产品”。

对于从事进口和出口的美人来说，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正变得越来越昂贵。在中国似乎将对 600 亿美元的美国出口产品进行关税报复之时，特朗普对自中国进口的剩余 2670 亿美元产品加税，即加税的第三阶段，似乎已经可以预先确定。

尽管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成员试图重启与北京方面的会谈，但特朗普本人却很少对谈判的前景和重要性进行权衡。不同于特朗普频繁的推文或对关税的评论，

他并没有明确表达出想从中国得到什么，或者他希望如何实现想要的东西。在特朗普总统亲自着手解决这个关键的问题之前，美国政府唯一可能的途径似乎就是代价高昂且具有破坏性的关税手段。

本文原题为“Trump and China Formalize Tariffs on \$260 Billion of Imports and Look Ahead to Next Phase”。本文作者 Chad P. Bown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Euijin Jung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分析师，Zhiyao (Lucy) Lu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分析师。本文于 2018 年 9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出口对第三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Sónia Cabral, Pedro S. Martins, João Pereira dos Santos 和 Mariana Tavares /文 吴克谦/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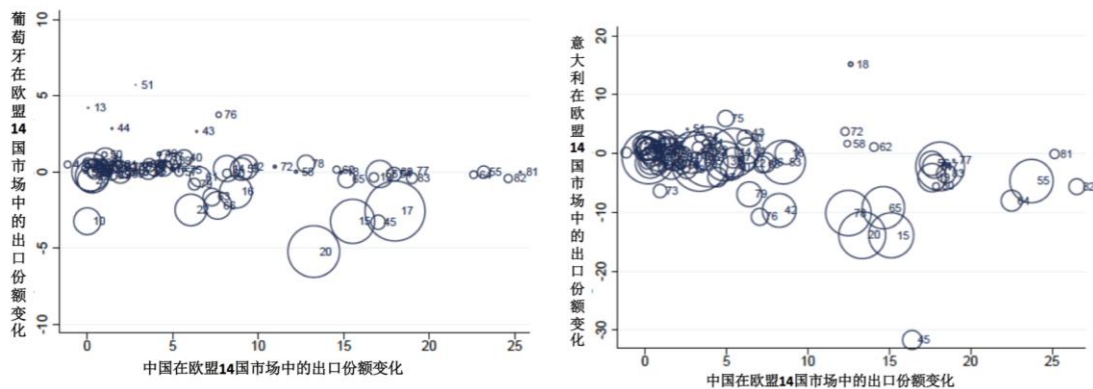
导读：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以葡萄牙为例，分析了中国国际贸易的扩张对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导致第三国市场竞争加剧，从而对葡萄牙工人的工资和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女性、年龄较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影响更大。编译如下：

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经济学领域的经典问题（Stolper & Samuelson, 1941）。近几十年来，国际贸易增长强劲，贸易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全球价值链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生产组织方式出现，同时新兴劳动力密集型国家已成为世界市场的关键参与者。在这一背景下，近期的一些研究在微观层面考察了进口渗透率的上升对不同工人群体的影响（Autor 等,2018; Dauth 等. 2018），侧重于关注那些专业化模式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同的国家。研究表明，那些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进口较多的本国行业中，调整成本相当高，这为“全球化存在输家”的观点提供了实证证据。

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水平不一定能反映两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程度。中国出口的强劲增长对某一特定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直接加剧了该国国内市场的竞争，也体现在加剧了该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而后者（间接市场窃取效应）对高收入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中国的出口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对低工资劳动力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低。对于一些国家而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带来的额外竞争压力已经持续了一些年。事实上，中国在低技术含量、低技能产品领域（如纺织品、服装、鞋类、电器、家具和玩具）出口市场份额的大幅提高，同时伴随着其他几个国家（如葡萄牙、意大利）出口份额的减少，如图 1 所示。

图 1 1993-2008 年间葡萄牙、意大利和中国在欧盟市场中的出口份额变化

(a. 中国和葡萄牙出口市场份额的变化； b. 中国和意大利出口市场份额的变化)



注：EU14 是指除报告国（葡萄牙或意大利）外的 14 个欧盟初始成员国；出口市场份额的计算方法为：中国（葡萄牙、意大利）对欧盟 14 国的出口额除以欧盟 14 国的进口总额，按行业划分，并计算从 1993 年至 2008 年的百分比变化；每个圆圈的大小与 1993 年葡萄牙（意大利）向欧盟 14 国出口的商品价值成正比；研究涉及的 83 个制造业请参考 Cabral 等(2018)。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CEPII - CHELEM 数据库的计算。

1、与中国贸易往来的增加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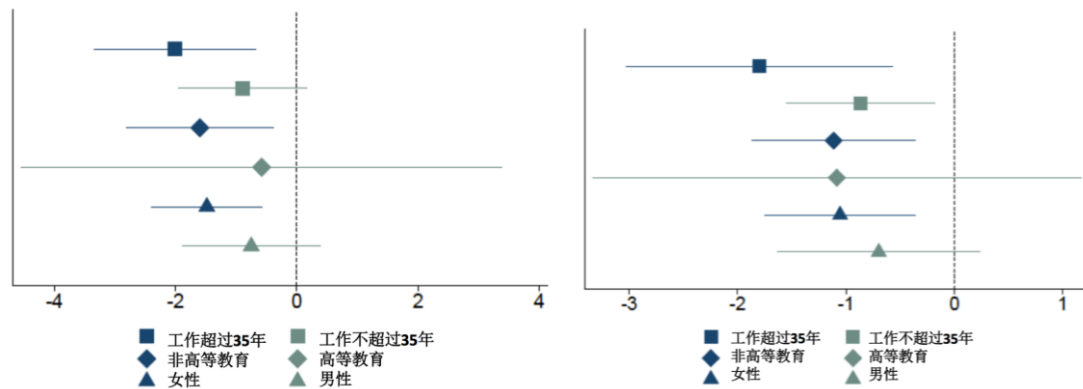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Cabral 等. 2018），我们同时研究了直接和间接两种影响。作为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葡萄牙的比较优势特征比其他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更接近于中国，对于葡萄牙的研究，不仅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了文献中所考察的直接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已有文献没有研究的间接影响。利用长期（1993-2008 年）的国家和行业贸易数据，我们提出了对贸易冲击的不同衡量方法，并将这些数据与葡萄牙全面的雇主-雇员面板数据进行匹配，将 1993 年每个工人与她最初的行业所遭受的冲击联系起来，然后评估贸易敞口对其在 1994-2008 年间累积工资收入和就业年限的影响。

与之前的研究一致，我们发现，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地位的增强对葡萄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冲击。然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对葡萄牙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影响大多不显著，这种负面影响完全是由于中国产品在葡萄牙主要出口目的地市场中具有较高的竞争力。通过比较位于间接进口敞口分布曲线的 25 分位数和 75 分位数，我们发现，那些受到来自中国的间接竞争影响更大的行业，其工人的累积工资和就业年限在 1994 至 2008 年间分别下降了约 25% 和 17%。

2、贸易敞口增加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目前，人们不仅对“国际贸易会对总体福利产生净积极影响”达成了共识，而且也广泛认同了“贸易会在一国内部带来异质性的分配结果，并对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产生影响”。贸易带来的不利影响往往集中在某些更易受到贸易竞争伤害的工人群体、行业类别和地区。因此，通过识别这类群体，可以极大地促进那些旨在帮助受影响的工人、减轻甚至逆转“贸易调整计划”（如招聘激励、就业补贴和培训）成本的公共政策的实施。研究发现，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工作者往往会遭受更大的就业和收入损失，如图 2。

图 2 中国间接竞争影响的异质性
(左图为累积收入；右图为累积就业)



注：与欧盟 14 国市场中来自中国的间接进口竞争度量相关的参数估计是通过针对不同工人群体的单独回归得到的；所有回归包括一系列个体、企业和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90%置信区间是通过聚类到行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构建的。

资料来源：Cabral 等(2018)。

3、结论

随着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品市场中地位的增强，各国可能会以多种方式受到影响，但是早期的证据几乎完全集中在直接影响上。本文基于葡萄牙的详细微观数据发现，中国的出口导致了第三国市场的竞争加剧，这种间接因素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这些发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冲击”的影响，葡萄牙及许多其他国家都受到了冲击，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有很大比例分布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企业中。此外，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行业（包括资本密集型行业）受到中国出口产品范围扩大和质量提升的影响，这种间接效应也越来越重要。

我们还发现，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地位的增强，对劳动力市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因人而异，这一结果支持了“贸易一体化会加剧不平等”的观点。因此，在制定旨在帮助那些在贸易中受损工人的公共政策时，考虑这种影响的个体异质性可能至关重要。

本文原题为“Third-party Labour Market Effects of China’s Exports”。本文作者 Sónia Cabral 是葡萄牙银行经济学家，Pedro S. Martins 是伦敦玛丽王后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João Pereira dos Santos 是新里斯本大学商学院博士生，Mariana Tavares 是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经济系博士生。本文于 2018 年 9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大湾区拥有真正的经济实力

Tim Summers/文 史明睿/编译

导读：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港珠澳大桥即将建成通车，香港、澳门、珠海的基础设施连通性进一步提升。大湾区的经济体量和人口数量已经可以媲美部分亚洲主要国家，区内企业正在由“世界工厂”逐步升级到价值链上游。未来，中国的这一地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加。编译如下：

9月23日，首辆高速铁路列车将驶离香港新建成的高铁站，去往中国其他城市。今年晚些时候，连接香港、澳门和珠海（珠江西岸）三地的大桥即将建成通车。这些昂贵且颇具争议的项目标志着香港与内地之间将由最新的基础设施联系起来。

公众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关注度正逐渐提升。大湾区由中国政府计划成立，目标是在华南地区发展出一个庞大的城市群，涵盖香港、澳门以及广东省九个最发达的城市。

在香港，上述项目的支持者认为这些项目标志着两岸连通进入新篇章，连通性增强可以为商业发展创造机会。而反对者却认为这是香港努力整合入大陆的体现。

大湾区比香港大得多，其基础设施的连通性也比香港好得多。中国部分地区的区域经济正变得与亚洲部分主要国家经济一样重要，而大湾区正是其中的一部分。粤港澳大湾区的GDP是1.5万亿美元，与韩国基本相同，人口约6700万，是中国人均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正如我在新书《全球化时代中的中国区域》（*China's Region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中所阐述的那样，从7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开始集中地融入全球经济，香港和内地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进入了新的阶段。

生产网络的出现帮助中国经济转型，广东省的深圳、东莞等城市变为“世界工厂”，促使香港经济增长、竞争力提升。广东省货物贸易额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29%，其货物贸易顺差占2016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47%。

但上述地区并不满足于“世界工厂”的地位。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广东经济中的许多部分已经迅速升级到价值链上游，广东成为一些中国最具全球竞争力企业的所在地。中国许多地区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在中国南方，尤其是深圳，这样的变革是真实的，但并没有受到许多西方企业的关注。

大湾区概念代表了中国政府通过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促使企业向价值链上游升级所做的努力。根据19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基本概念，大湾区

的目标不是整合或同化该地区的不同经济部分。相反，目标是利用大湾区各个城市的不同优势，鼓励合作，合理利用不同城市、公司的比较优势。

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与中国中央集权决策的随意假设相反，中国的省市政府和商业精英决定了经济、商业政策的具体制定和实施。而中国城市相互竞争，而非合作的自然趋势，使得诸如大湾区这样的计划难以实施。特别是，香港未来的两极化愿景（贴近或远离内地）使得香港很难找出参与计划的方法。

但是，无论政治或政策框架如何，大湾区经济的活力和创新性意味着这一地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加。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将更加关注中国经济的这一巨大动力。

本文原题为“China’s Greater Bay Area Has Real Economic Power”。本文作者 Tim Summers 为 Chatham House 亚太地区高级咨询顾问。本文于 2018 年 9 月刊于 Chatham House 官网。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有关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研究

Silvia Merler/文 安婧宜/编译

导读：Sonali Jain-Chandra 在 IMF 官方博客发布的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表格，表明了 1990 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由 15 上升到了 50。近年来，中国不平等情况加剧。教育差异和城乡收入水平差异都造成了这一现象。而中国也通过改变税收政策、调整个税起征点来缓解不平等状况。与俄罗斯的对比表明，中国改革开放是渐进且全面的，不平等状况较之俄罗斯更轻。而与美国的对比表明，在剔除房价影响前后，中美不平等对比情况有所改变。编译如下：

Sonali Jain-Chandra 在 IMF 的博客上发布了一张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表格。这张表格来自于近期发表的工作论文，它表明了中国基尼系数 1990 年以来由 15 上升到了 50。这一改变改变是巨大的，尽管不平等加剧的部分原因是发展水平的提高。

教育差异是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技术变革和产业化发展催生了高水平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城乡收入差距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教育水平在乡村始终保持较低水平，中国的户口制度使得劳动力流向工资水平较高的城市变得困难起来。

尽管中国实施了一些限制不平等的政策（如提高最低工资和个税起征点，废除农业税，提高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水平），Sonali Jain-Chandra 仍旧认为，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政策规定，中国的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税收将更加依赖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

Ben Westmore 认为，从基尼系数来看，收入不平等水平在 2008 年达到高点后呈现出下降趋势——这表明中西部和东北部的收入水平正在提高，逐渐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也在减小。

在不同收入分配中，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涨幅巨大。但是，一些证据表明，中国最贫穷的人口仍然被远远甩在后面，收入差距从未减小。在农村地区，这一差距甚至扩大了。中国的税收体系和转移体系造成了这一差距，税收的再分配效果也被大大削弱了，因为政策更加偏向高收入人群。关于社会安全的法律也一直止步不前。

在税收方面，Gabriel Wildau 在金融时报的文章认为，中国在计划调整税收，以促进消费，减缓不平等。新的税收政策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每年 6300 美元提高到 9000 美元，这一政策会影响到数以百万的人口。最高的分界点为 20%，其起征点从 16000 美元提高到了 45000 美元。在年收入为 27000 美元到 45000 美元的区间内，几乎所有个税缴纳者都享受到了减税带来的福利。中国也会改革财产税，但这一改革饱受争议，其进程也会更加漫长。

Filip Novokmet, Thomas Piketty, Li Yang and Gabriel Zucman 比较了中国和俄罗斯近期由共产主义转向资本导向的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公共和私有财富的积累程度，也比较了两国在收入不平等方面政策的差异。

在中国，改革是渐进且全面的。这场改革是逐步实施的，由沿海城市扩展向内陆省份。而俄罗斯的情况则正相反，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从公共资产到个人领域和自由市场原则的建立都有涉及。

中国和俄罗斯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在转型期间都有所加剧，但俄罗斯的不平等情况却更为严重，而中国则较为缓和。在后共产主义时期，不平等的产生不是无法避免的，政策、机构以及缓解不平等的方法都很重要。

图1 最高10%和最低50%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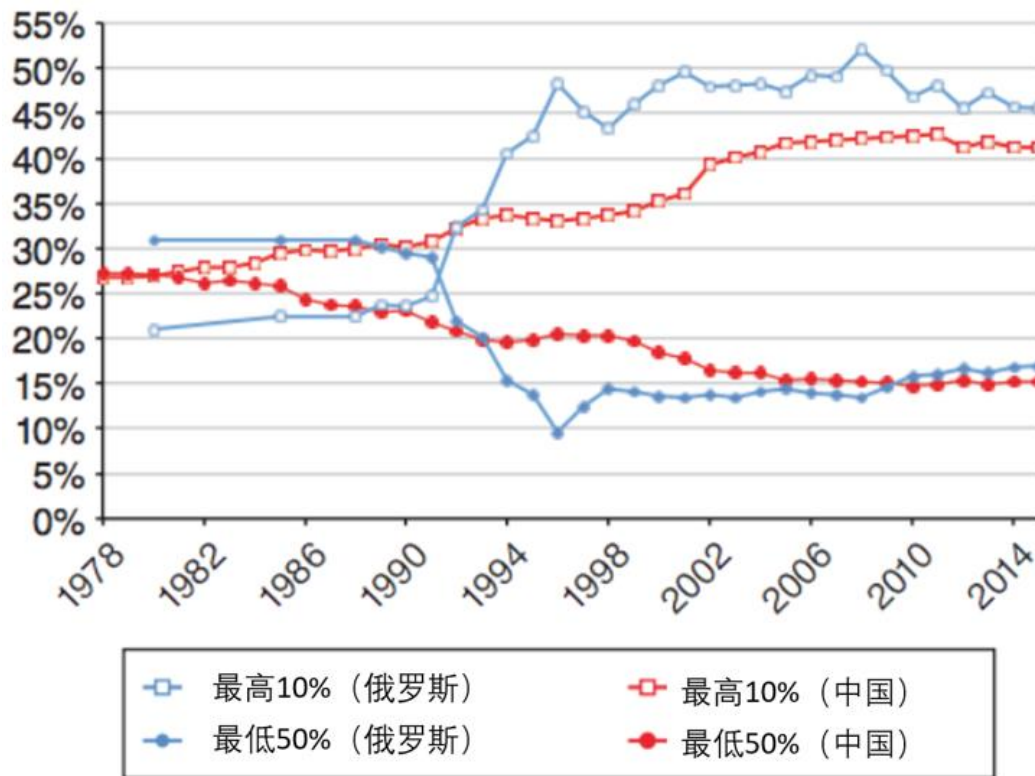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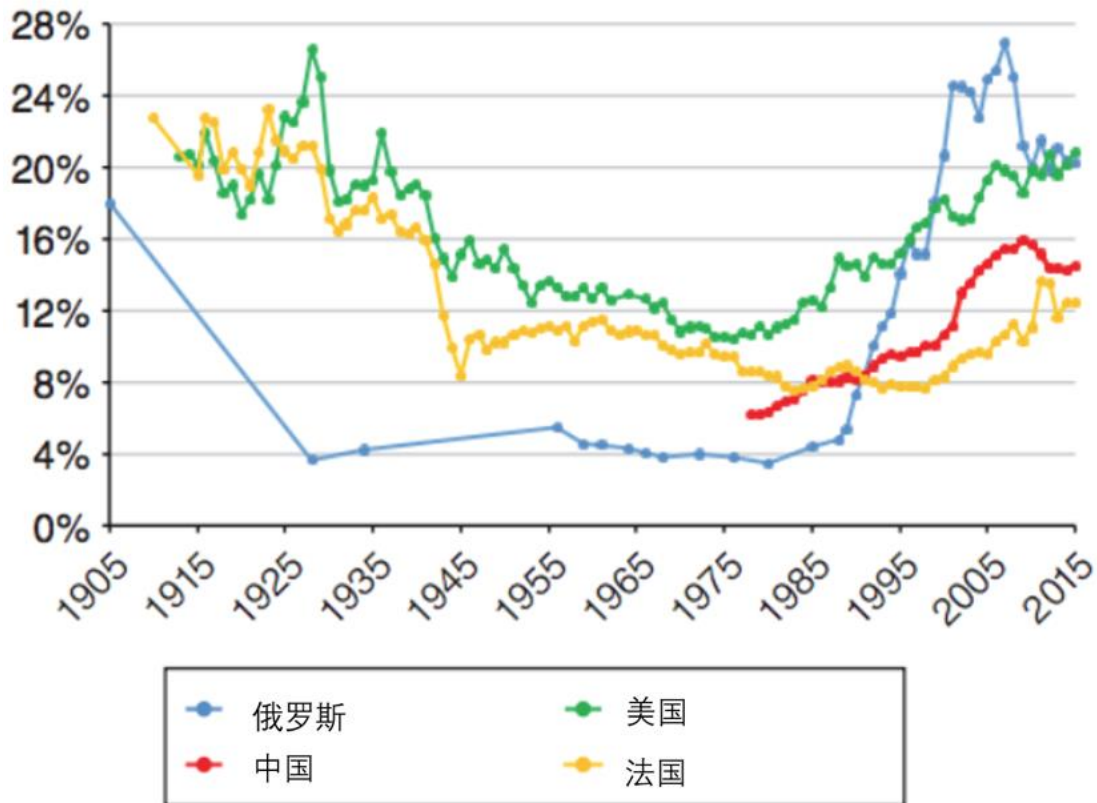


图2 最高1%收入人群收入份额



Brian Reynold and Yi Wen 则研究了中国和美国的房屋成本和区域收入不平等。一个国家内部的生活标准可能会因房屋成本有巨大的差距，所以经过地区房价调整的收入可以为我们展现更加清晰的图景。他们构造了一个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剔除了中国和美国地房价影响。只考虑可储蓄收入，美国地区不平等程度小于中国。但是考虑到房价影响后，中国省份的不平等程度有所缓和，而美国不同州的情况则更糟。

表1 基尼系数：中国和美国

	2015 人均可储蓄收入	2015 地区房价	2015 区域生活标准
中国基尼系数	0.19	0.30	0.16
美国基尼系数	0.08	0.21	0.12

Xiaohui Hou, Shuo Li and Qing Wang 调查了金融结构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并构建金融工具以缓和收入不平等。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和银行总贷款相比，股票市场的金融资本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因为股票市场的流动提高导致了收

入不平等加剧。金融结构影响了中型公司，从而影响了收入不平等。证据支持了金融结构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应该促进债券融资，减少股票市场过度投机行为。

本文原题为“Inequality in China”。本文作者 Silvia Merler 是 Bruegel 智库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9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多德-弗兰克法案对小企业的影响

Michael D. Bordo 和 John V. Duca/文 申劭婧/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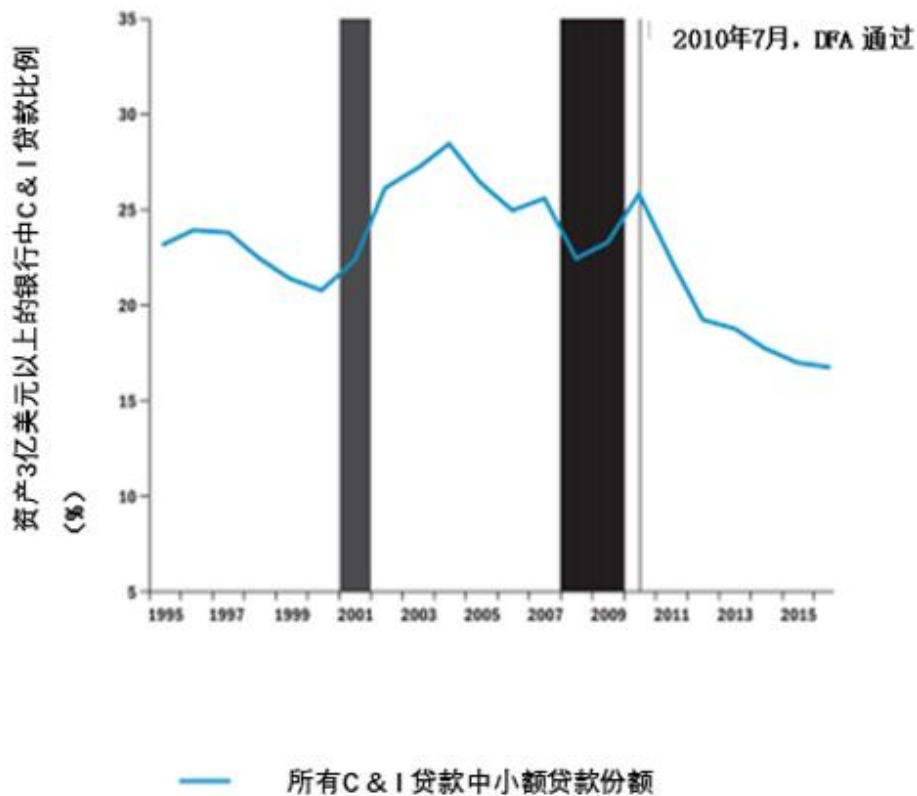
导读：颁布于 2010 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 (DFA) 本意是为克服导致 08 年金融危机的美国金融业过度杠杆和系统性风险的问题。但是自从其颁布之后，很多人质疑它导致了银行对小型企业贷款规模的大幅下降，不利于小型企业的发展。本文作者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编译如下：

多德-弗兰克法案 (DFA) 颁布于 2010 年，旨在克服美国金融业过度杠杆和系统性风险的问题，而这二者是造成 2007-2008 年巨大金融危机的根源。但是自颁布之后，这个多层次法规各个组成部分实际功效的大小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许多人一直批评沃尔克规则 (Volcker Rule)，而另一些人则对资本比率的提高和对银行进行周期性压力测试的要求表示欢迎。然而，金融界、政治界和新闻界越来越担忧 DFA 对小型银行和小企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其中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 DFA 阻碍了小型企业贷款，因而阻碍了它们的业务拓展。事实上，近年来企业扩张速度确实异常缓慢。由于提高了发放企业贷款和经营银行的法定要求，DFA 不成比例地降低了银行发放小额贷款的心愿，并使得小型银行更难生存，而在商业和工业 (C & I) 贷款中小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占比通常远远高于大银行的占比。与此同时，由于压力测试往往会赋予小企业更高的风险评估，所以小企业获取商业和工业贷款数量相对其他企业也会下降。有人认为，在经济大萧条复苏时期，由于这些密集而影响广泛的边缘效应，DFA 阻碍了对小企业放贷。

事实上，如图 1 所示，尽管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自 DFA 于 2010 年通过后，资产 3 亿或以上的银行中 100 万美元以下的贷款在整体商业和工业贷款中的占比就发生了暴跌。推动这一发展的过程包括 2011 年 100 万美元以下的商业和工业贷款的实际总量的下跌，以及 2016 年之前持续缓慢的部分回升。而自 2010 年以来 100 万美元以上的商业和工业贷款的实际总额增加了 80%，这与前者形成鲜明对比。正式的稳健性检查表明，这不是通货膨胀的产物，也不是名义 GDP 增长导致贷款在不同规模的银行之间转移的结果。事实上，在 1993 年至 2010 年间，小型和大型实际贷款增长幅度大致相同，分别为 79% 和 67%。

图1 DFA 通过后，商业和工业（C & I）贷款中小额贷款的比例



来源：形势和收入综合报告，联邦财政机构检查委员会及作者计算

在大型银行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即小额商业和工业贷款的份额下降，并且这不能归因于 DFA 颁布之前银行体系内小银行不断整合的趋势。根据 1993 年以来的年度数据，我们发现这两类银行 2010 年后小额贷款的下落 (9%) 不能归因于商业周期效应或银行融资成本差值的变动，而似乎是由于 DFA 通过后进行的监管改革引起。根据初步预测，这一制度效应对小型银行的影响更大。这些结果与人们担心的事情相符，即 DFA 可能无意中减少了对小企业的贷款。

为了进一步评估这种模式的出现是否仅仅因为在 DFA 实施的同时还发生了贷款需求转移，我们使用银行贷款官员调查数据来审查信贷标准变化，以评估 DFA 是否导致了对小企业贷款供应的减少。银行调查结果显示，在 DFA 对较小的银行机构要求最严格的时期，较中、大企业而言，小银行在发放商业和工业贷款时对小企业的信贷标准更为严格。这一调查数据与过去三月内小企业向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报告的信贷可用性降低的内容相符。此外，贷款调查数据显示，2015 年对小型银行机构的监管松弛可能有助于阻止对小企业的贷款供应相对于大型企业进一步降低，但它并没有扭转早先由 DFA 引起的相对下降。

规模经济使得遵守贷款条例的固定费用增加，因此对银行发放小额贷款的激励不足，并导致银行业的进一步整合，即在更大程度上导致借贷给小企业的小型银行减少。与 DFA 导致银行业减少对小企业贷款的担忧相一致，我们发现商业和工业贷款中小企业份额下降的趋势在 DFA 获得通过的时间点上有了一个明显的断层。考虑到对商业周期的控制，经济复苏时间可能的错位和小型企业贷款份额暴跌，最近的下跌趋势应该更多地来源于 DFA 引起的对大萧条的政策反馈，而不是在这一萧条时期非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自 2010 年以来，商业和工业贷款中的小企业份额下降了 9%，而我们的结果表明，这一下降大部分与 DFA 的通过有关。

本文原题为“[The Impact of the Dodd-Frank Act on Business](#)”。本文作者 Michael D. Bordo 是罗格斯大学教授，John V. Duca 欧柏林学院教授和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顾问。本文于 2018 年 9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空前重要的美日关系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文 伊林甸甸/编译

导读：在近期的中美贸易战中，令许多人高度担忧的，是美日欧是否会携起手来，建立一套排除中国的国际贸易体系。在 CSIS 近期发表的一份政策报告中，包括约瑟夫·奈在内的几位作者明确指出，美国有必要对美日同盟进行一系列改革，加强日本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并呼吁日本率先在亚太地区推行缩小版的 TPP（即 CPTPP）。编译如下：

纵观全球，日本无疑是美国最强大的盟国之一。更为喜人的是，日本与美国在许多共同关切的重大问题上立场相近，利益相通。然而，日美同盟关系也面临着潜在的风险。美国政策界有一些声音质疑日本近期前瞻性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是否与其国家实力、经济增长前景、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安全需求相适应。毫无疑问，美国和日本都有必要进一步齐心协力，共同巩固这一宝贵的同盟关系，以确保亚太地区长期的稳定和繁荣。

美日同盟的强大是有目共睹的，而双方都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过去五年间，美日两国签署了新的国防指导方针，更新了指挥协调机制，并共同研发了标准-3 Block IIA 型弹道导弹拦截系统。日本在国内通过了一系列国防法案，授权其自卫队与美军开展联合自卫行动、改进其情报和保密机制、制定了更加积极的国防和外交战略，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同时，美方也提出了再平衡战略，确保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开放与和平。美日两国的领导人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为两国的亲密关系增添了一抹亮色。

但是，美日同盟的未来也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其中最危险的就是特朗普总统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抛出的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事实上，尽管美日两国在经贸问题上确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我们都看不出美国有任何正当理由可以借题发挥，对美日两国宝贵的同盟关系进行威胁。诚然，美国和日本确实在上世纪 80 年代打过一场贸易战，但我们也应该时刻牢记眼下已是二十一世纪，而区域内的各种安全威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局势，美日两国更应该携手应对，而非消极退让。美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而自信的日本，而日本也需要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美国。我们在这份报告中对美日两国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并希望藉此进一步强化两国间的同盟关系。

两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美日两国稳固的同盟关系不仅对两国安全和共同利益至关重要，更是关乎着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以及整个国际秩序的稳定健康。从历史来看，美日同盟在以下四大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在二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创造并维护了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为区域带来了超过七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第二，美日两国在捍卫人权、民主、自由贸易和法治等重大议题上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这些共同的价值观不仅使得美日同盟更加巩固，也对区域内其他国家发挥着良好的示范效应；

第三，美日两国都拥有强大的、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创新经济。美日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加起来占到了全球的 30%；

第四，美日两国还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过去几十年间，美国和日本一直注重军事与安全合作，对东北亚的长期和平功不可没；

不过，尽管美日同盟相当强大，但两国的亲密关系也面临着一系列威胁和阻碍，总的来说有以下四点：

第一，由美国和日本参与构建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胁。从外部来讲，集权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兴起，对美日两国长久以来信奉的自由资本主义构成了挑战。从内部来看，以美国现任领导人为代表的一些政治人物轻视现行国际秩序的重大价值，并时常抛出有损两国关系的言论；

第二，两国领导人的言论与共同价值观不再一致。特朗普政府交易式的同盟方式和独裁领导人无限制的插手许多盟国对美国在追求人权、民主、自由贸易和法治事业方面的信心；

第三，保护主义的阴云已遍布全球。长期以来，中国采用不公平的贸易措施，侵占了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成果。与此相比，特朗普总统则在利用民众情绪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而这些措施并无益处。特朗普政府已达到美国历史上重商主义的巅峰，但日本可以继续对其国内经济进行自由化改革；

第四，尽管美日同盟的军事实力依然强大，但其与中国军力的差距正在快速减小。过去几年间，中国不仅国防实力突飞猛进，而且还热衷于在争议地区采取大胆的巡逻行动，这大大挑战了美日同盟维护地区安全的能力；

当然，以上这些困难绝非是不可克服的，但要有效应对这些挑战，美国和日本就必须采取更加协调的、更具前瞻性的政策措施，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贸领域都应如此。

美日同盟的最新动向：政治层面

客观地讲，当前美日双方国内都存在有政治层面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危及美日同盟的稳定。尽管安倍总理成功连任对美日同盟来说是个好消息，但美国国内两年来的政治变动以及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言论还是伤了许多日本政治家和政策界人士的心。特朗普不仅反复重弹“盟友负担论”的老调，还坚持宣称美国对日本贸易的逆差对美国造成了伤害。另外，特朗普还时常呼吁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盟国增加本国军费开支，并公开抨击美军前沿部署的成本过高。

不过，总体而言美日关系还是在各方努力下正朝着更加紧密的方向迈进。早在 2016 年特朗普正式上任前，安倍总理就专门飞抵纽约拜会特朗普。在这之后，安倍总理又分别在华盛顿和海湖庄园多次会见特朗普。两人之间的多次会面使得两国元首有机会频繁探讨许多双方共同关心的国家安全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冲击。在过去一年半里，美日两国元首就朝核问题及美日贸易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

2017 年，朝鲜频繁进行了多次洲际弹道导弹实验，这种行为间接使得美日同盟关系更加紧密。安倍总理和特朗普总统都是“极限施压”战略的拥护者，两人携手努力，致力于争取联合国的支持，对朝鲜核试验进行制裁。此外，日本还对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投入了大量资金，帮助其美国盟友一道应对东北亚的战略导弹威胁。作为回应，美国也积极相应由日本提出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秩序”框架，并在国际上加以配合。

日本和美国的争端主要集中在贸易和其他经济事务上。在上任之初，特朗普总统决定撤出 TPP 谈判，这对日本决策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此外，美国在美日双边贸易谈判中展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态度，以及以国家安全为名对日本征收钢铝惩罚性关税，都极大冲击了原本亲密的美日关系。所幸，双方于 2018 年 9 月发布的声明意味着两国向美日双边贸易协定的最终达成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这一协定最终是否能够落实，依然有待我们观察。

军费开支的分担问题也是当前美日两国争论的重点之一。事实上，日本在美日同盟的军费开支中承担了相当可观的一部分——除了本国自卫队的军费开支外，日本还一直负担驻日美军的大量开支。据测算，日本政府大约承担了驻日美军开支的 75%。仅去年一年，日本政府就向驻日美军支付了 61 亿美元。我们不应忽视日本政府对美日同盟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但是，日本政府也应该进一步增加本国的军费开支，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来自中国、俄罗斯及朝鲜的军事威胁。日本政府目前的军费开支仅占其 GDP 的 1%，这显然与当前日益紧张的东北亚局势不相匹配。

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军费和资源的使用效率，美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日本的协防承诺。否则，如果日本在国防问题上丧失对美国的信心，那么前者就会被迫将宝贵的资源投入到军力的重复建设上，这对于美日同盟而言无疑是不利的。我们建议美日两国领导人在未来进一步达成一系列协定，明确对彼此的盟友义务，从而巩固美日同盟的实力。

美日同盟的最新动向：经贸层面

众所周知，美日两国在经贸问题上并非一直亲密无间。但是，近年来两国在经贸问题上的利益是相当一致的，之前美国和日本在 TPP 谈判中的紧密合作就是明证。美日两国的经济总量加起来占到 TPP 初创成员国的 80%，这使得美日两国得以如愿地在协议中引入若干严苛的准入条款（如涉及国有企业和数字经济的规定）。事实上，这正是美国和日本所签订的《美日安全条约》第二条的主要精神，这一条款要求缔约国推行相近的经济制度，从而最大限度减少经贸往来中的摩擦，并推动经济一体化。也正是因此，这个条款为美国和日本的经贸合作提供了事实上的框架。但可惜的是，由于特朗普政府执意退出 TPP 谈判，美国和日本将不得不谋求其他途径来达成上述目标。

事实上，如果由美日两国牵头在区域内推行一套更加稳定、协调的经贸体系，那么目前困扰美国的两个头号问题——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经济衰退——都可能迎刃而解。当然，这要求美日双方共同努力，精诚合作。目前，美国政府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尽管美日之间在许多经贸领域都存在竞争关系，但日本并非美国经济上的对手。相反，日本是与美国拥有相似价值观、相似制度和共同利益的，不可或缺的经济盟友。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美国在经贸领域的外交政策应当做出相应调整。美国和日本在经贸领域上合则两利，败则两伤，而在面对中国威胁时尤其如此。当前，安倍总理正在通过推进 CPTPP 的方式，为日本积极谋求区域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决定了美国近期内还难以重新推动 TPP 谈判，因此日本有必要肩负起这个历史使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抢先一步，大力推进高标准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对于自由世界来说，这一任务在当前显得尤为迫切，这是因为中国正积极推进其一带一路战略。不光是美国和日本，欧盟今后也有必要加入进来，迅速推进并最终完成 TPP 未尽的事业。

若干政策建议（提要）

具体来说，美国和日本的同盟关系在未来最需要做哪些工作？本报告给出了十点政策建议，提要如下：

- 重申对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承诺；

- 改革军事基地驻防安排，由驻日美军和日本各自卫队共用基地，减少不必要的军费开支；

- 建立美日联合快速反应部队；
- 在日本建立自卫队联合指挥系统；
- 编制美日联合应急作战计划；
- 共同研发/升级军事装备；
- 扩展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 加强美日韩三国的防务合作；
- 发起成立区域基础设施投资基金；
- 打造一项覆盖面更广、目标更具体的区域经济战略；

总结

对于美国来说，全世界再也找不到日本这么好的盟国；而对于日本来说，美日关系目前也已变得空前重要。美日两国在许多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例如两国享有相似的价值观、稳定的民主体制、富有活力的经济、可观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因此，美日同盟是亚太秩序天然的压舱石。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日同盟正在出现裂痕。因此，美日两国有必要迅速采取手段，对持续数十年的美日传统盟友关系进行进一步调整，从而更好地团结印度洋——太平洋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共同应对愈发严峻的区域局势，并在 21 世纪为全人类打造一个团结、稳定、繁荣的亚洲秩序。

本文原题为“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Renewing the U.S.-Japan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本文作者 Richard L. Armitage 曾担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目前担任 CSIS 董事会董事；Joseph S. Nye 是“软实力”的提出者，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CSIS 董事会董事。本文于 2018 年 10 月刊于 CSIS（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 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RAND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8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3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 (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的美国家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 (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 (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 (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